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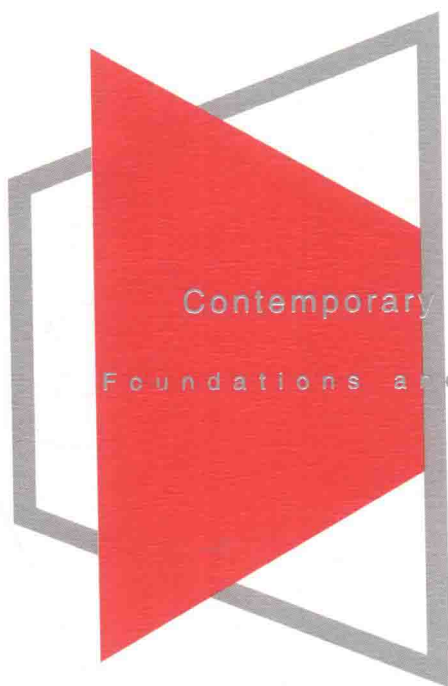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

应奇 刘训练 主编

当代国家理论

基础与前沿

郭忠华 郭台辉 编



Contemporary State Theory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

应奇 刘训练 主编

当代国家理论

基础与前沿

郭忠华 郭台辉 编

Contemporary State Theory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国家理论: 基础与前沿 / 郭忠华, 郭台辉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3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

ISBN 978-7-218-11218-3

I. ①当… II. ①郭… ②郭… III. ①国家理论—研究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4282 号

DANGDAI GUOJIA LILUN: JICHU YU QIANYAN

当代国家理论: 基础与前沿

郭忠华 郭台辉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 划: 钟永宁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陈泽航 梁 茵

封面设计: 周伟伟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政治译介之再出发

——写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第三辑出版之际

应 奇 刘训练

最好地实现了古代人自由观念的城邦也是最近似于现代人自由观念的城邦。

——Alain Boyer (阿兰·博耶)

作为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的产物，现代性从它肇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并不是一种单数的存在。正如启蒙运动是一种复数的存在，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被区分为英国自由主义、法国自由主义、德国自由主义，如此等等。这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原因不但应当到诸如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去寻找，而更应当用现代性规范论证的基本结构来说明。德国哲学家汉斯·布卢门贝格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最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按照他的洞见，现代性包含自我奠基和自我肯定两个维度。从表面上看，自我奠基是一种理论关切，自我肯定则是一种实践关切，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作为“规范的唯一来源”的主体性原则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向自身内部寻求规范”和“反思能力运用于自身”（哈贝马斯语）的结果是：笛卡尔的自明原则是一种自我奠基，孔德的实证精神同样是一种自我奠基；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所有”是一种自我肯定，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也同是一种自我肯定。于是就有所谓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之说，斯特劳斯则有著名的现代性三波之论，而现代性冲动中潜在的虚无主义倾向更是悖谬性地成

了滋生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沃土。

无论就西方政治哲学还是中文政治哲学的语境而论，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都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并没有随着政治现代性的崛起而寿终正寝或偃旗息鼓，而是内化到了后者的基本结构之中，并成为现代性政治论辩的基本视域。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斯特劳斯主义者有见于此，毋宁说，这种认识应当是现代性的任何堪称健全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认知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政治哲学中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分野与争雄即其显例。而新保守主义者极力诟病乃至轻薄讥诮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拨动西方智识人的心弦，触动他们的神经，并不仅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层面上为当时流行的福利国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论论证，而在敢于直面西方现代性内部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并通过发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约论的论证水平，调和与综合洛克和卢梭的政治遗产。而哈贝马斯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奋争多年之后，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具体来说，商榷性政治观基于卢梭和康德关于公域自主和私域自主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直觉，试图通过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内在概念联系把自由民主的实践激进化，从而扬弃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和作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的共和主义这两种互竞的政治哲学范式之间的时代错乱的抽象对立，实现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与和解。

因此，如果说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哲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那么自由与民主的二元性和内在张力就既是政治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根本标志，也是政治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自由与民主之间的二元性又进一步体现为自由内部的二元性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及民主内部的二元性，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但是，无论是政治现代性内部的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对峙，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的论战，都没有越出以上诸种二元性的概念樊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出现了第三种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这

种同样以复数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概念和模式试图突破传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当与善、国家与社会甚至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区分，提出了使得政治哲学能够更为充分地应对文化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的新思路。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哪种立场看，中文政治哲学的成长和构建都不能自外于这一脉动中的大潮。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需要和问题意识出发，在重新审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基础上，把批判性的视野进一步伸展到平等观念、公民德性理想、分配正义模式以及国家的中立性和文化的理想等更为广阔的论域中去，如此才能为中文政治哲学的成熟形态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坚实的根基。

要达成这一目标，不但需要清除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闻新保守主义之风而动，轻率地无视和否定西方主流现代性政治哲学之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这显然是因为，如果说在哈贝马斯所言说的语境中，现代性尚且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那么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中国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回避原子主义政治文化的本体论痼疾，“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不但无力解决自由多元社会的自我赓续问题，而且由于政治哲学目标的自动降格，更极大地遮蔽了一种扩展的反思平衡和视界融合在全球普遍交往时代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自由主义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种族中心的。正如消极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可坐而享之的或在形而上学上是清白的，而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且从一开始就与近代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联系在一起；积极自由也并不总是灾难性地与唯理主义的一元论形而上学难分难解，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以回应价值和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系列两辑，现在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第三辑。置身于当代的语境，本系列将不但重视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而且重视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它的主旨则是围绕当

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人物，请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自行编选专题文集。这样做一方面发挥了编选者的能动作用，体现了某种独特的认知效能，有益于提升翻译工作的品位；另一方面加大了单本书的信息量，也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了入门津梁，可以作为各专题研讨的基本读物，相信学术界和读书界都会欢迎这样的形式。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中文政治哲学同仁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必定能够以这种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在参与塑造汉语学术自主形态的人们面前，并成为这一同样“未完成的谋划”的内在、重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2016 年 10 月

编者导言

郭忠华

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理论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国家研究至今已有两千余年，有关国家的文献堪有充栋之富。尽管如此，对于国家的研究却并非已经清楚，由于世界国家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对于国家的研究从来不可能完成。本书编辑的目标在于，于海量的国家理论文献中精选出一本反映当今国家理论最新态势的读本，使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而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这一目标成为本书的最初编辑思路。

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后期国家理论变化之概貌并非易事，待编者浏览有关国家研究之著作时，发现即使对于这一较短时期的国家现象也存在着诸多完全不同的解释。比如，即使在新制度主义学派这一较为特定的分析流派那里，对于国家都存在着迥异的想法：公共选择学派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的结果，历史制度主义把国家看作是对于历史的“路径依赖”的结果，社会学制度主义把它看作是特定“文化机制”的结果，话语制度主义把它看作是通过“话语沟通”而形成的结果。更不用说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其他学术流派对于国家的诸种解释。同时，除众多新社会思潮给国家理论带来崭新的解释之外，有关国家的基础理论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也取得诸多突破。比如，对于权力研究的推进，对于暴力、革命的重视，对于国家起源的新解释，对于福利国家的类型化等。这意味着，要实现本书的编辑目标，不能从既有文献中没有目的地挑选，而是必须放眼民族－国家之变化本身，通过梳理这些变化

来型构本书的框架。

二十世纪中后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典型时代。这一时代既传承于历史，又开创着新的阶段。从前一方面而言，民族－国家并非一蹴而就之物，而是长期历史演化之结果。如果把民族－国家的特征刻画成“清晰的国家领土边界”“明确的国家成员身份”“鲜明的国家主权”“现代化的军事暴力”和“民主化的治理体系”等方面，那么，这些方面是长久历史演化的结果。纵观历史，民族－国家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初创阶段，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二战后的后三十年和冷战后的十年。民族－国家在观念上得益于启蒙运动带来的成果。启蒙运动不仅开启了人与人关系的新时代，让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深入人心，为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奠定了观念基础，而且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纪元，那就是自然被彻底对象化，现代工业成为人类主宰自然的手段。启蒙运动奠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但当民族－国家已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并展现其各种问题时，契约论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的社会历史解释。在这一方面，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于民族－国家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分析，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起源、动力、问题和未来等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形成了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的分析路径和理论体系。

但是，三大思想家仅代表了学术界对于民族－国家初生阶段的理解，此时的民族－国家还未展现其全貌，世界也还未进入典型的民族－国家时代。只有随着此后民族－国家三次飞跃式发展的到来，传统帝国才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世界才真正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当代近二百个民族－国家中，有 177 个产生于后三个时期。^① 与初生阶段的产生方式不同，此后的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不再表现为以思想理性化、劳动分工、经济危机、阶级斗争等传统、长期和内生的动力，民族－国家可能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也可

^① 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

能在一夜之间赫然耸现。如果把第一次民族－国家的产生看作是基于经济、阶级等基础上的内生动力的结果，那么，“去殖民化”在第二、三次民族－国家产生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原来为帝国所瓜分的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资格。但与第二、三次民族－国家产生的浪潮不同，最后一次民族－国家的产生则更多体现为既有国家的“分裂或分离”，去殖民化不再出现在此次浪潮中。

伴随着民族－国家产生方式的变化，对于国家的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在第二、三次国家产生浪潮之后，最耀眼的国家理论流派莫过于形成于上世纪中后期的“回归国家”学派。这一众星云集的学派将眼光投向了暴力、革命和战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难理解，因为刚刚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催生民族－国家的最重要动力，现在的问题是要问，革命发生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和革命如何使民族－国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斯考切波）？围绕战争问题，建国者如何与诸社会力量讨价还价并最终建立起民族－国家（梯利）？战争如何催生民族主义、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体系（吉登斯）？等等。而面对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兴起的新浪潮，给研究者们提出的问题则是，何种类型的国家会最容易被瓦解、何种因素是瓦解民族－国家的最持久力量（罗伊德）？新国家的制度设计如何才能长久（埃尔斯特等）？这意味着，既有国家的制度结构成为探讨最后一波民族－国家产生的新视角。一言以蔽之，国家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与之相伴的国家理论也不断更新升级，每一次国家巨变的浪潮都带来了国家理论的新突破。

如果我们把视角从民族－国家的演变转向对民族－国家本身的研究，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家研究也表现出诸多新的转型。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最为重要：第一，从对国家的逻辑推演转向对国家的社会历史研究。从历史最深处一直到启蒙运动前后，对于国家的研究曾长期体现为以某种先定观念（如神话、伦理、哲学等）为基础的逻辑推演，研究者以逻辑推演的方式探讨国家如何起源、国家应该为何等，社会契约论是这种研究方式的最后高峰。随着民族－国家越来越取代传统国家而成为主导的形式，对于国家的

历史社会学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对于国家的“实然”研究越来越取代传统的“应然”想象。第二，从对国家的宏观描述转向对国家的微观和中观研究。宏观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研究在传统国家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体”一直是传统国家理论的核心主题。研究者常常从气候、种族、文化、经济等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政体形成的原因和优劣，试图从中找到最佳的政体。但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的国家研究主题不断趋于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政治行为、政治态度、利益集团、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等主题的微观研究。行为主义在这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是，行为主义并没有成为研究方法的终结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临近结束之时，行为主义已日益受到挑战，因为它过于关注科学和微观的问题而使政治学越来越远离了“价值”和国家问题。^① 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国家”学派应运而生。怀着坚定的“将国家带回来”的信念，以埃文斯、斯考切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从战争、革命、组织、制度等角度重新聚焦国家，但此时的国家研究并非复归往昔的路径，而是在继承了行为主义诸多遗产的基础上“带回国家”，国家研究体现得更趋中观的色彩。

第三，除上述之外，二十世纪后半期国家研究的转型还体现在，从国内政治研究转向比较国家研究。在马克思时代和以前，国家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上，比较国家研究即使存在，也没有成为主流。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大量陌生民族－国家的出现，如何从各种迥异的民族－国家中总结出普遍性规律，已成为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国家研究的基本任务。以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代表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兴起，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有关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研究则代表了比较国家研究的成熟时期。比较国家研究不仅追求对民族－国家进行类型化，而且追求对民族－国家诸要素的比较和总结。二十世纪后半期国家研究的最后一种转型或许体现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上。在二十世纪之前，国家研究尽管也

^① 德怀特·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载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0页。

存在学科交叉的性质，如国家同时是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主题，但这种交叉主要体现在伦理和哲学层面，交叉的范围并不广。这主要是由于实证科学在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所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国家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这方面首先体现在经济学向政治学进军而带来的新制度主义视角上。诺斯、科斯等人本来是经济学家，但他们将经济学的解释路径应用于政治学主题。在这种思维范式下，国家成为理性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国家的产生、国家的更替等被解释成掌权者出于利益最大化目的而带来的结果。当然，制度主义是一个大家族，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带来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发展。它秉承结构主义的解释进路，将国家解释成历史文化的结果。二十世纪后半期见证了国家研究的复杂化，不仅传统的国家研究范式凤凰涅槃，形成诸多新的解释思路——这方面最有代表者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而且由各种新社会运动所催生的思潮也侵入国家研究领域，形成以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国家解释。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国家学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本书的编辑秉承民族－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演化和国家研究的历史转型这两条思路，一方面考察二十世纪后半期国家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另一方面考察国家理论的跨学科发展。这两条思路形成了本书的上下两篇。上篇以国家起源问题作为起点，分别考察国家权力、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成员身份、福利国家、军事暴力等方面。下篇则选编了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化等各种思潮对于国家的阐释。由于各章已经有详细的内容阐述，这里将不再简介各章的内容。全书尽管存在着上述逻辑关联，但章与章之间完全是独立的，读者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有需要的章节进行阅读。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前文有关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化和国家研究

的范式转型主要局限于西方的语境，并不表示中国与之同步。相反，在笔者看来，民族－国家尽管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国民族－国家的到来却姗姗来迟，同时，它也不属于内生型民族－国家，而是在第三次民族－国家建立的浪潮中通过非殖民化方式建立起来的。如斯考切波所言，由于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等诸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也走上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国家研究上，中国的国家研究从思辨走向历史、从宏观走向微观和中观、从单一国家研究走向比较国家研究以及国家研究的跨学科发展等转型也要比西方更晚，有些甚至目前还处于起步当中——比如比较国家研究、跨学科研究等。

本书尽管只是一本选编之作，但却历时长久，融汇了诸位友人的心血。我首先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教授，本书的编选多蒙他的邀请和信任。我也感谢参与本书翻译的诸位译者，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便不可能问世。郭台辉教授组织了本书近一半篇幅的初稿翻译，他的加入大大加快了本书的进度。笔者在形成选编框架和选定文献之后，还对所有译稿进行了逐篇校对。我还要特别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陈泽航编辑，他对全部稿件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对，发现和改正了其中不少问题，他的细致和认真使本书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个电子设备和电子信息汹涌澎湃的年代，凭借纸质书籍所带来的改变已然有限，一本选编之作能够带来的影响则可能更加有限。诚知情况将会如此，但仍以认真的态度把它做到最佳，实此间之思想光华，不容人掩瑜也。

2016年2月24日于祈乐苑

作者简介

(按本书文章出现的顺序)

菲利浦·罗伊德 (Philip G. Roede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San Diego) 政治学教授, 主要研究兴趣为苏联后共产主义国家, 出版的著作包括《红太阳的陨落: 苏联政治的瓦解》《民族-国家从何而来》《后共产主义与民主理论》等。

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美国社会学家,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 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理论, 出版著作主要包括《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不连贯的帝国》、《民主的阴暗面》等。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英国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前校长, 英国上议院议员, 主要学术兴趣为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理论, 出版《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等著作四十余部。

乔尔·米格达尔 (Joel Migdal), 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罗伯特·菲利浦国际关系研究教授, 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理论、中东政治等, 出版著作包括《巴基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农民、政治与革命》《强社会与弱国家》《以色列的棱镜》等。

威廉姆·罗格斯·布鲁巴克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 主要研究社会理论、公民身份、民族性等, 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法德的公民身份与民族性》《重构民族主义: 新欧洲的民族性与国家问题》等。

苟斯塔·恩斯平-安德森 (Gøsta Esping-Andersen), 丹麦社

会学家，主要研究福利国家和后工业社会，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后工业经济的社会基础》《政治反对市场》等。

卡伦·巴基 (Karen Barkey)，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与政治社会学、帝国与帝国组织研究、政治与宗教、宗教与族群宽容、民族主义、国家控制与反抗、比较视野下的奥斯曼帝国。出版的著作包括《差异的帝国》《强盗与官僚》《帝国之后：多族群社会与民族构建》等。

苏尼塔·帕里克 (Sunita Parikh)，现为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种族与族群、制度、比较方法，出版著作包括《偏好的政治：美国和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亲和行为》等。

柯林·海伊 (Colin Hay)，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理论、后马克思主义、英国政治等，出版著作包括《我们为什么憎恨政治》《战后英国政治》《新工党的政治》等。

薇文·施密特 (Viven Schmidt)，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整合和国际关系、欧洲政治经济制度和公共政策，出版著作包括《欧洲的政策变迁与话语》《开放经济的福利与工作》等。

安德鲁·辛默 (Andrew Hindmoor)，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政治、公共政策以及理性选择研究，出版著作包括《处于核心的新工党：建构政治空间》(编)、《政治分析》等。

阿兰·芬利森 (Alan Finlayson)，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主要研究政治理论，出版著作包括《理解新工党》、《当代政治思想》(编)、《政治与后结构主义》等。

詹姆斯·马丁 (James Martin)，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意大利政治理论等，出版著作包括《葛兰西政治分析》《安东尼·葛兰西：批判性评估》等。

约翰娜·坎图拉 (Johanna Kantola)，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兴趣为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政治学国际期刊》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大卫·马什 (David March)，英国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等，出版著作包括《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视野下的政策网络》《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等。

尼克拉 J. 史密斯 (Nicola J. Smith)，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系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全球化、公共政策等，出版著作包括《展示全球化?》《爱尔兰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等。

尼克拉·弘特 (Nicola Hothi)，英国公共政策执行顾问，主要研究兴趣为英国的公共政策，出版著作包括《处于核心的新工党：政治空间的构建》以及其他学术论文。

目 录

编者导言	郭忠华 / 1
------------	---------

作者简介	1
------------	---

上 篇 当代国家：基础理论

民族－国家的创建方式	菲利浦·G. 罗伊德 / 2
------------------	----------------

一、1816—2000 年民族－国家的创造模式	5
-------------------------------	---

二、区隔制度理论	9
----------------	---

三、一些专门用语	12
----------------	----

四、区隔制度的后果	15
-----------------	----

五、边缘政治	18
--------------	----

六、边缘与中心之间的政治	20
--------------------	----

七、一些共同答案的启示	23
-------------------	----

八、民族主义	26
--------------	----

九、政权对国家认同的协调	33
--------------------	----

十、赋予某个民族特权的“种族化”	38
------------------------	----

十一、国际承认	43
---------------	----

十二、结论	45
-------------	----

国家的自主权：起源、机制与结果	迈克尔·曼 / 49
-----------------------	------------

一、界定国家	52
--------------	----

二、国家权力的双重含义	53
-------------------	----